

從貴族問題看《紅樓夢》與《人間喜劇》 的異與同*

甘 佳 平**

摘 要

在二十世紀的中國，隨著巴爾扎克文學及恩格斯等哲學家的引進，「輓歌」逐漸成了《人間喜劇》的代名詞。因此，在中法比較文學興起的同時，《紅樓夢》也無法逃離被視為輓歌文學的命運。只是，這樣一個說法在五十年後的今天引起了爭議：《紅樓夢》是否和《人間喜劇》一樣，都在為貴族獻輓歌？本論文將以貴族問題做切入點，逐一審視這兩派學者的論點，試著從中找到一個合理的答案。首先，我們將先了解兩方貴族的定義及運作，接著，我們將討論巴爾扎克文學及輓歌文學的關係。最後，我們將就小說裡呈現的「貴族問題」來進一步確認這兩部作品的異與同。

關鍵詞：巴爾扎克、《人間喜劇》、曹雪芹、《紅樓夢》、貴族

* 衷心感謝審稿人的細心閱稿及建議，本人受用無窮。

** 國立中央大學法文系助理教授（chiaping@ncu.edu.tw）

投稿日期：101.04.26；接受刊登日期：101.07.17；最後修訂日期：101.07.25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nd The Human Comedy: Comparison of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through the Problem of Nobility

Chia-ping Kan*

Abstrac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Balzac's literature and the rise of philosophers such as Engels, "elegy" gradually became synonymous with *The Human Comedy*. While th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urned into noticeable,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was also categorized into the elegiac literature. However, after half a century, such an argument arouses a controversy: is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the same as *The Human Comedy* that sings the dirge for the nobility? In this thesis, we will be focusing the problem of "nobility" by examining points made by scholars from both sides, and then try to come up with a reasonable conclusion. First, we will try to comprehend how "nobility" is defined by both sides and how it works for them; next, the discussion will be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Balzac's literature and elegiac literature. Lastly, we will distinguish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renc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Received April 26, 2012; accepted July 17, 2012; last revised July 25, 2012.

the lik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pieces through the problem of “nobility” as presented in the novel.

Keywords: Balzac, *The Human Comedy*, Cao Xue-q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nobility

前言

「五四」(1919)之後,巴爾札克¹(Honoré de Balzac, 1799-1850)作品在中國被公認為「寫實主義」的最佳代表作,作者對周遭事物敏銳的觀察及深刻的剖析使他在眾多引進的外國作家裡迅速地脫穎而出,廣受中國讀者的愛戴。因此,「新中國」後(1949),《人間喜劇》在中國掀起了一股熱潮,除了整套書籍 137 部作品在短短的幾十年間被二十多名譯者齊心合力翻譯成簡體中文,²在 1999 年出版完成《巴爾扎克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三十卷)之外,也陸陸續續有數百名的學者致力於巴爾札克文學的研究,先後發表的各類型文章共有 800 篇之多。光是 1978-1999 年這二十年間,就有三十多部相關研究作品、近 500 篇文章問世,涉研人員近 400 名。³

很快地,這股外國文學熱潮也啟發了一些中國學者的省思,巴氏文學和中國經典文學的比較研究變成了一個熱門的主題。因此,《人間喜劇》與《聊齋志異》(1680)、⁴《儒林外史》(1750 前)、⁵《紅樓夢》(1742-1764)及《金鎖記》(1943)⁶的比較文章陸續出現。其中,又以和《紅樓夢》的

¹ 兩岸對作者的名字在翻譯上有不同的見解。在台灣,我們習慣將之寫為巴爾「札」克,在中國,則為巴爾「扎」克。為了尊重學者著作權,在引文時,我們會特別注重此問題。

² 和中國相比,台灣對巴爾札克作品的翻譯顯得不甚熱衷,曾以繁體中文上市的小說大約只有七本:《三十歲的女人》、《高老頭》、《小氣財奴葛蘭岱》、《驢皮記》、《幽谷百合》、《貝姨》、《邦斯舅舅》。而且,後四部作品目前是呈絕版狀態。

³ 蔣芳,《巴爾扎克在中國》(北京: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頁9-10。

⁴ 朱嫻輝,《〈聊齋志異〉與《人間喜劇》商人形象之比較研究》,《雲夢學刊》卷31期4(2010年7月),頁113-115。

⁵ 王寶琴,《〈儒林外史〉與《人間喜劇》之比較》,《青海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卷32期1(2006年),頁129-131。

⁶ 李新麗,《黃金枷鎖下兩個女人的悲劇:曹七巧與歐也妮形象的比較》,《合肥教育學院學報》期1(1996年)。

比較最為頻繁。在我們找到的資料中，共有七筆之多。除了二十世紀中期的〈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⁷，還有六篇於近十年發表的文章：〈熱炭寒冰總酸辛——鮑賽昂夫人和薛寶釵婚戀悲劇淺識〉⁸、〈金錢砵碼下的敗將，宗法祭壇上的犧牲——鮑賽昂夫人和薛寶釵婚戀悲劇淺識〉⁹、〈才自清明志自高，出於末世運偏消——鮑賽昂夫人和薛寶釵婚戀悲劇淺識〉¹⁰、〈“巴爾扎克現象”與《紅樓夢》的輓歌情調〉¹¹、〈曹雪芹“不像”巴爾扎克〉¹²，到近二年剛出版的〈巴爾扎克與曹雪芹創作思想比較論〉¹³

為什麼其它研究文本只能出現最多一篇文章，而與《紅樓夢》的比較卻可以在近半個世紀後又成功地引發出另一股熱潮？我們有幾個可能的解釋。第一，創作時間接近。相較於《聊齋志異》、《儒林外史》或是《金鎖記》，《紅樓夢》與《人間喜劇》的寫作年代最為接近。若以《人間喜劇》的首本作品（作者以真實姓名發表）《舒昂黨人》（*Les Chouans*, 1829）¹⁴來做年份比較，這兩部小說最多相差八十七年，最少才六十五年。

⁷ 李希凡、藍翎，〈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紅樓夢評論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頁1-20。

⁸ 張明慧，〈熱炭寒冰總酸辛——鮑賽昂夫人和薛寶釵婚戀悲劇淺識〉，《南通師專學報》卷9期3（1993年），頁29-34。

⁹ 張明慧，〈金錢砵碼下的敗將，宗法祭壇上的犧牲——鮑賽昂夫人和薛寶釵婚戀悲劇淺識〉，《南通師專學報》卷10期1（1994年），頁28-32。

¹⁰ 張明慧，〈才自清明志自高，出於末世運偏消——鮑賽昂夫人和薛寶釵婚戀悲劇淺識〉，《鹽城師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期1（1994年），頁14-26。

¹¹ 張毅蓉，〈“巴爾扎克現象”與《紅樓夢》的輓歌情調〉，《南通師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卷16期2（2000年），頁49-52。

¹² 王進駒，〈曹雪芹“不像”巴爾扎克——論用批判現實主義評析《紅樓夢》〉，《紅樓夢學刊》期3（2000年），頁170-184。

¹³ 李群英，〈巴爾扎克與曹雪芹創作思想比較論〉，《社科縱橫》卷22期10（2007年），頁99-101。

¹⁴ 這部小說歷經幾次重大修改，巴爾扎克於1845年才決定將之定名為《舒昂黨人》。

此外，若我們接受《紅樓夢》後四十回是高鶚和程偉元在 1788-1791 年間的著作的說法的話，那麼，《紅樓夢》的完稿時間和《人間喜劇》的寫作年代僅相差了四十年的時間。第二，社會百科全書型的寫實手法。這兩部作品在東西方各享有「社會百科全書」(encyclopédie)的美譽，透過作者對人物、環境的刻劃，讀者猶如身入其境，除了可以見證人物的愛恨情仇之外，還可以深刻感受到當時的社會、政治問題。第三，描寫主題相似。無論是在《人間喜劇》或是在《紅樓夢》裡，「貴族」都扮演著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他們的興衰似乎都與作者的寫作動機息息相關。關於這點，早在二十世紀中就已被提出討論：

像十九世紀法國偉大作家巴爾扎克一樣，曹雪芹 [.....] 從自己的家庭遭遇和親身生活體驗中，已經預感到本階級 [貴族階級] 的必然滅亡 [.....] 正如恩格斯評論巴爾扎克時所說的，「他看到了他心愛的貴族滅亡的必然性，從而把他們描寫成不配有更好命運的人.....」¹⁵

此派學者普遍認為，巴爾扎克和曹雪芹的寫作靈感主要是來自於對周遭生活的體驗，在「預感」貴族即將衰亡後，他們拾筆寫下眼前歷史，藉著作品、人物的遭遇感嘆過去美好的時光。

在以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 的分析做為後盾的情況下，此一說法在五十年後的今日似乎並沒有引起太多的爭議。在〈“巴爾扎克現象”與《紅樓夢》的輓歌情調〉一文裡，我們可以發現，張毅蓉教授所預定的討論方向，就是在完全接受前人思想的前提之下所立定而成的。在這篇文章裡，巴爾扎克二十多年的心血結晶被「輓歌」二字

¹⁵ 李希凡、藍翎，〈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紅樓夢評論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

帶過；「輓歌情調」一詞簡單界定了《人間喜劇》137部作品的寫作內容。至於《紅樓夢》，似乎就是「巴爾扎克現象」的再現版：

《紅樓夢》的藝術魅力雖來自各個方面，但深沉凝重的輓歌情調卻是它的關鍵所在。筆者擬從「巴爾扎克現象」入手，追蹤攝跡，探尋曹雪芹的複雜的歷史觀及其與輓歌情調的關聯，從而找出《紅樓夢》輓歌情調的魅力及其形成的深層原因。¹⁶

然而，幾個月後，不同的聲音出現。在〈曹雪芹“不像”巴爾扎克〉一文裡，王進駒教授大膽地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強調兩件事，希望能補足前人尚未釐清的討論。第一，《紅樓夢》和《人間喜劇》的寫作手法完全不同，曹雪芹力求將「真事隱去」的態度有別於巴爾扎克的「批判寫實」。有關這一點，我們已經在〈從《人間喜劇》到《紅樓夢》——虛幻下的寫實〉一文裡有所討論。第二，若巴爾扎克真是在為法國貴族吟唱「輓歌」的話，那麼，曹雪芹的狀況則截然不同。因為，從客觀的歷史角度來看，中法兩國的封建制度是在完全不同的狀況下崩解的，法國人民的自覺反抗和中國人民因為外來力量的侵入而被迫改變（自鴉片戰爭起）的情況無法相提並論。也因此，王教授認為，曹雪芹是不可能會和巴爾扎克有一樣心情的：

曹雪芹生活的時代正是清王朝的盛世，曹雪芹去世時（1763 或 1764）乾隆“全盛”剛開始 [.....] 不能因為康乾盛世隱含有衰的矛盾因素，就不顧實際地斷定為“封建社會崩潰前夕”，事實上曹雪芹的時代 [.....] 決沒有像十九世紀法國的資產階級衝擊

¹⁶ 張毅蓉，〈“巴爾扎克現象”與《紅樓夢》的輓歌情調〉，《南通師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卷16期2（2000年），頁49。

和代替封建貴族的巨大的社會變動；生活在這樣時代裡的曹雪芹從哪裡看得到整個封建社會的將要衰亡的趨勢呢？¹⁷

那麼，事實究竟為何？哪一派學者的論點最接近事實？《人間喜劇》和《紅樓夢》的寫作主旨是否都是在哀悼貴族階級？可以確定的是，無論結果為何，「貴族」一議題點出了巴爾扎克和曹雪芹的異與同。這兩位東西方作家不約而同地在貴族議題上找到他們的創作泉源，然而，在這個大方向下，他們的寫作背景似乎又不盡相同。因此，本文將針對此問題做討論。首先，我們將先了解貴族階級在兩個不同文化裡的定義與運作方式。接著，我們將試著了解巴爾扎克文學與「輓歌」的關係。最後，我們將由小說內容呈現的「貴族問題」來討論《紅樓夢》與《人間喜劇》的異與同。

壹、東西方貴族的定義與運作

既然巴爾扎克和曹雪芹不約而同地將「貴族」問題視為他們創作的主要泉源，我們首要了解的，是這兩個貴族制度的定義與運作模式，以進一步確認兩位作家筆下的「貴族」在東西方社會裡扮演的角色。

在歐洲，封建制度起源於中古世紀，主要是以世代相傳的血統貴族（*la noblesse*）¹⁸為主。封建主義可追溯至古羅馬帝國晚期的社會結構和

¹⁷ 王進駒，〈曹雪芹“不像”巴爾扎克——論用批判現實主義評析《紅樓夢》〉，《紅樓夢學刊》期3（2000年），頁171。

¹⁸ 法國大革命前，*noblesse*（拉丁文，*nobilis*：享有盛名的人）指的是享有世襲權的終生貴族，*aristocratie*（希臘文，*aristos*：最好的、精英；*kratos*：權力）指的是「由精英組成的政府」（*gouvernement des meilleurs*）。差別在後者不是以「血統」相傳的傳統貴族，沒有世襲的特權，完全是依個人能力（*mérite*）來贏得政權人士的青睞。不過，這種區分在大革命後已不復存，在今日的法文裡，*noblesse* 和 *aristocratie* 二詞指的都是貴族，表示在舊制（*l'Ancien régime*）社會裡享有一定特權的人。

日耳曼蠻族原有的軍事組織，一個領域內的統治者（le suzerain）為確保其領土的完整及政權的穩固，會劃分出一部分土地給身旁驍勇的戰將（vassal），使其在領地上享有絕對的自主權。然而，得到「采邑」的「貴族」則需透過宣誓（le serment），證明自己對統治者的忠心，在國家有難時，以「鮮血稅賦」（impôts du sang）來證明的責無旁貸。至於居住於采邑上的「附庸」（le serf），則必須完全服從領主的旨意，向其貢獻自己的勞力，以取得生命、財產之保護（la protection）。

由此看來，歐洲的土地分封制是想要建立一個「軍事型社會」，「貴族」的選才完全建立在其軍事能力上。因此，歐洲封建制度反映出貴族與國王、人民三者間互助互利的關係。某種程度上來看，貴族的存在是為了滿足國王與人民的需要：前者需要貴族的效忠，後者需要貴族的保護。為此，前者分割一塊領地，後者付出勞力。在這個環環相扣的三角關係中，每個人都要盡到自己的責任和義務（les obligations），一旦有任何一方決定終止這個合作關係，那麼，貴族的存在將會受到威脅，社會的安穩將會受到影響。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法文裡，「忠誠」（la fidélité）與「封建」（la féodalité）為同字根字，這似乎強調著「忠誠」為封建體系的基本原則。

分封制的結果，造成采邑與貴族間密不可分的關係，領地變成了爵位的封號。例如：「巴黎伯爵」（comte de Paris）的「伯爵領地」（comté）即為巴黎市；「勃根地公爵」（duc de Bourgogne）的「公爵領地」（duché）即為勃根地省。由於歐洲爵位世代相傳之故，久而久之，采邑變成了貴族家庭的「私有財產」，統治者無法任意收回。換句話說，歐洲貴族的特權身份沒有期限，只要家中有男丁可以繼承，家族爵號就可以一直永續留傳下去。因此，不難想像，歷史越悠久的貴族家庭勢力越大，能對皇權造成的威脅也就更不容輕視。

藉由社會學家喬治·杜梅齊(Georges Dumézil, 1898-1986)提出的「社會三階論」(la tripartition sociale)，我們可以進一步了解歐洲社會的組成概況。數千年來，印歐社會(les sociétés indo-européennes)可以分為三階層：農民、貴族及神職人員。依據「身份」的不同，人們分別擔任不同的工作。農民負責製造與生產，提供民生必需品；貴族負責保衛國家、人民的安全，在必要時隨時待命，甚至犧牲自己寶貴的性命；至於神職人員，除了是人民精神生活最大的支柱之外，還需要確保文化、倫理的發展與遵守。值得注意的是，這社會階層的劃分(l'ordre)是「與生俱來」的(une nature)，是人力無法任意變更的。農民的後代只能是農民，貴族的後代則享有一定特權。如此用意，不外是希望人人都能堅守自己的工作崗位，讓國家社會能穩定發展。

在中國，皇族、貴族的封號又稱「爵」(第十三、十八、五十三、五十八、一百五、一百二十回等)或「官爵」(第四、九回等)。因此，在《紅樓夢》裡，曹雪芹甚少以「貴族」(第三十五、一百二十回)一詞稱呼權貴人士，而是以「爵」、「官爵」、「王爵」(第十四回)、「世襲官員」(第五十五回)、「世襲公子」(第七十五回)或「世襲職員」(第一百七回)等詞彙。清朝的爵位共有三種不同的系統：宗室爵位、蒙古爵位、和異姓功臣爵位(又稱「民世爵」)。第一類型流有皇室血統；第二類型是前朝驍勇善戰的將軍(清皇希望他們能在優渥的生活條件下，和平地歸附滿清帝國的統治)；第三類型則是一些曾經幫助滿人建立清朝的關外老百姓。《紅樓夢》裡賈家的爵位來源即屬於此第三種類型。榮寧二公既沒有皇室也沒有蒙古血統，此外，他們在第五回合裡，曾跟警幻仙姑表示他們身為開國元勳的驕傲：「吾家自國朝定鼎以來，功名奕世，富貴流傳，已歷百年」。因此，整體來說，無論是那一種類型的封爵，受封人或

是受封人的親戚、祖先都必須曾立有軍功，都必須以他們沸騰的鮮血證明他們的不同。就此選才標準而言，東西貴族制度似乎是有其相似之處。

然而，不同於西方的「永久世襲」制，兒子可依法繼承父親的頭銜，貴族是個永不改變的身份，在中國，爵位有「遞降承爵」的問題：¹⁹爵位每繼承一次，會自動降一個等級。以清朝為例，除了對立朝有功的十二王公家庭（又稱「鐵帽子王」）可永遠享有同樣的爵位與特權之外（世襲罔替），其它的爵位，在承襲時都必須遵守「降襲」的規定。若以「民世爵」為例，民世爵包含了公（分三等）、侯（分四等）、伯（分四等）、子（分四等）、男（分四等）、輕車都尉（分四等）、騎都尉（分二等）、雲騎尉、恩騎尉九個爵位等二十七等級。若父親的爵位是一等公，兒子的爵位就會是二等公，而這個家族最多可以世襲二十六次爵位。但是，一般來說，每個家庭只會有三、五代的爵位。在預設的世襲權使用完畢之後，原本的爵就會被降為平民，永遠失去特權的身份。例如：在小說中，林黛玉父系的家族本來只有三次襲爵的機會，但因皇帝隆恩盛德，額外加恩，讓世襲的爵位可以延續到第四代，林如海的身上。因此，除了十二「鐵帽子王」外，其他的爵最終都會面臨到喪失爵位，淪為平民（roturier）的一天（若是出生皇族，則會被降為「閒散宗室」）。²⁰

不僅制度本身如此，中國爵位還很有可能因為受到本身或外力的影響而變得不穩定。例如，在小說中的第一回裡，賈雨村是個窮書生，準備進京赴考。在第二回裡，他成功入舉，順利取得知府一職。然而，在上任不到一年後，他就因為「貪酷之弊」而遭到削官「革職」（第二回）。

¹⁹ 這是魏晉時代在見證了西周因貴族勢力日漸強大而造成的威脅後，開始實行的新制度。

²⁰ 閒散宗室本無品級頂戴，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後，才因為皇帝隆恩，賞賜著四品頂戴、武職補服之權。但這類型宗室並沒有四品實職，除了每年領有些許的「俸祿」之外，並無任何實權。

不過，很快地，靠著林如海的引介及賈政的幫忙，他在第三回裡又順利謀得金陵應天府一職，風光地返回官場。因此，透過小說活靈活現的描述，我們發現，中國的貴族身份只是一種「短期」的狀態。爵位看似崇高的地位其實是非常脆弱，變化不斷的。

再者，爵位的賞賜與土地的分封也沒有絕對的關係。²¹在中國，只有極少部分的高階皇族（輔國公以上的王公）可以配有「莊園」的「收租權」（而不是所有權）。的確，即使像榮寧二府因為身份崇高被分配有「莊子」（第七回），他們對其土地的管理權也是相當有限。一般來說，中國爵被迫定居於北京城內（特別是皇族宗親），²²因此，他們無法像歐洲貴族一般，自由地居住在自己的領地上，只能透過「莊頭」幫忙收租及管理「莊地」（第五三回）上的一切。在這種情況下，對社會地位極不穩定的中國爵而言，莊園的收租權無法證明他們屹立不搖的身份，領主與附庸間的從屬關係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一種單純的地主與佃農間的經濟關係。

在清皇們的處心積慮之下，中國爵的確有許多的限制，但是，在某種程度上，中國的權貴制度卻要比西方來的有彈性，甚至「先進」。除了先前談及的爵位系統之外，從隋朝開始，一般平民百姓亦可透過「科舉」制度（605-1905）來實現取得「官爵」的夢想。在小說裡，我們可以從林如海的例子裡一探究竟。在家族的世襲權終結後，林如海閉門苦讀，成功地一路考到「殿試」（需先考取童試、鄉試及會試等資格），取得「探

²¹ 事實上，「分封制」曾出現於西周時期。只是，有鑑於土地分封造成的權力失散，間接促成日後英雄割據的混亂世代，秦始皇在統一六國後，聽從李斯的建言，大力推行「郡縣制」。至此之後，「中央集權」取代了分散的皇權，各地官員一律改由中央統一任免。因此，漸漸地，地方政府喪失了實質政權，變成了中央的傀儡。在《紅樓夢》裡，我們可以在賈政、賈雨村等人身上觀察到這由中央任命地方官的現象。

²² 賈家是居住在金陵，即今天的南京。

花」名次（相當於全國高考第三名。第一名為狀元，第二名為榜眼），靠著自己的努力重新取得功名，光宗耀祖。

然而，這種「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的現象卻有些類似於今日「公務人員」(fonctionnaire)的特考制度。這公開選才的制度讓爵位不再是一種與生俱來，永不改變的身份，而是一種人人都可以靠後天努力而取得的成果。換句話說，中國的「官職」讓貴族變成了是一種「職業」，而不是一種世代相傳，維持社會穩定平和的核心角色。這樣一個差異性當然也反映在經濟收入上。相較於西方貴族的經濟獨立（靠領地的收入為生），中國爵的生存是完全仰賴中央政府的。除了高階貴族（大部分仍為滿人）才能享有我們先前提過的莊園收租津貼之外，大部分的爵，依其「官爵」大小，每年領取一次包括金錢、白米的「俸祿」（第一百六回）。若家中遇有婚喪喜慶等特殊狀況，皇帝還會因此再發放相關補貼。²³

因此，雖然東西方都會在優秀的軍官中選取貴族人才，以確保國家一定的和平。然而，在運作模式上，兩方卻存在有不少差異性。在歐洲，貴族是個永不改變的身份，他的存在與穩定和國家的興亡有直接的關係。介在國王與人民之間，其「牽一髮動全身」的角色很難被取代。因為，倘若這個階級消失，國王將失去軍事上的依靠，人民的生活將得不

²³ 原則上，滿族貴族是被禁止從事任何商業行為的。然而，由於「俸祿」不夠開銷，不少貴族子弟常另闢財源，從事一些具爭議性的行業：「清中葉後有宗室經營茶館、戲院，還有涉及旗丁生計的分子錢、轉子錢之高利貸。」賴惠敏，《天潢貴胄——清皇族的階層結構與經濟生活》（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頁289。特別的是，這項條文並不適用於一般的貴族。亦是說，不同於西方貴族，大部分的中國貴族是有權經商的。因此，在《紅樓夢》裡，賈家從事放高利貸的行為、林如海被欽點為「巡鹽御史」的例子並不令人訝異。這類似於今日鹽務局局長的職務就是個專門負責食鹽買賣，終日與金錢打交道的工作。

到基本的保護，社會秩序將不復存，全國將陷入一片混亂，封建制度將勢必面臨瓦解的危機。

反觀中國，在中央集權的強權統治之下，中國官爵沒有一定的身份與地位、責任與義務。他們唯一的工作不是保衛國土的完整，他們不是社會結構裡一個強而有力，一個無法被取代的階層。相反地，他們脆弱的只像是皇帝手中的一顆棋，對後者只能被動的服從，不能有任何一絲「越界」的要求。即使因為種種因素導致他們喪失「特權」，他們仍得完全地服從皇上的旨意。因此，他們與統治者的關係並不是建立在一套「互信」的機制之上，而是在「從屬」關係上。中國爵位變成了一種暫時性（*temporaire*）的身份，爵位的去留與否，要看繼承者與皇帝的關係，最順利的話，這也只是三、五代的事情，權力最終是要回歸皇帝的。從這角度來看，「封爵」與今日的「出任公職」似乎有些異曲同工之妙。「做官」、「任官職」是一種人人嚮往，人人皆可透過熟背四書、五經來實現的理想。

因此，即便「貴族問題」不約而同地啟發了巴爾扎克與曹雪芹的寫作靈感，但是，他們筆下的「貴族」在定義與運作上呈現了一定程度的差別。西方的貴族，與社會結構緊密連結在一起；中國的爵位，卻只像是一種短期的任務（*fonction*），一種「公職」。

在了解兩位作者筆下的「貴族」的不同之後，現在，我們將從小說和歷史兩方面來探討兩派學者的論點：究竟曹雪芹是否真和巴爾扎克一樣，都在為貴族獻唱「輓歌」？

貳、巴爾扎克文學，「輓歌」文學？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首要確定的是巴爾扎克與「輓歌」的關係。根據教育部編纂的國語辭典（1994）的解釋，「輓歌」是「哀悼死者的歌」。而第一個以「輓歌」（*elegy*）²⁴形容巴爾扎克作品的，是著名德國哲學家恩格斯。他在《給哈克納斯女士的信》²⁵裡解釋道：

巴爾扎克在政治上是一個正統派，他的偉大作品是對上流社會必然崩潰的一曲無盡的輓歌；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滅亡的那個階級方面。但是，儘管如此，當他讓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貴族男女行動的時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諷刺是空前辛辣的。……巴爾扎克就不得不違反自己的階級同情和政治偏見；他看到了他心愛的貴族們滅亡的必然性，從而把他們描寫成不配有更好命運的人；他在當時唯一能找到未來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這樣的人 [.....]²⁶

的確，巴爾扎克可以算是個「正統派」（*légitimiste*），不過，根據 Bernard Guyon 的說法，這其實是 1831 年後的事了。²⁷在這之前，巴爾扎克是個滿腹雄心壯志、傾向共和思想、支持自由民主的年輕作家。有關這點，

²⁴ 根據 *Macmillan Dictionary* 的解釋，*elegy* 的定義為：a poem or other piece of writing expressing sadness, usually about someone's death，與中文的定義大同小異。

<http://www.macmillandictionary.com/dictionary/british/elegy>。

²⁵ 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著，瞿秋白譯，〈給哈克納斯女士的信〉，《現實文學》期 2（1936 年），頁 233-235。此信件原文名為“Engels to Margaret Harkness In London,” *Marx-Engels Correspondence 1888* (Moscow: 1953)。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88/letters/88_04_15.htm，2012 年 4 月 1 日檢索。

²⁶ 蔣芳，《巴爾扎克在中國》，頁 64。

²⁷ 巴爾扎克是在撰寫“Le Départ” (1831)一文時開始明顯轉向保守派的。

我們可以從《人間喜劇》的首部作品——《舒昂黨人》（1829）——裡找到證明。從作者的用字遣詞，我們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他對保守派（*conservateur*）批評以及對共和派（*républicain*）的期許：保皇派士兵被描寫成是一群一心只想著個人利益，在得不到酬勞的情況下，隨時準備背叛君王，投靠拿破崙（*Premier Consul*〔首席執政〕）的自私人物。封建主義互信互利的制度可以說是完全瓦解。反之，共和派士兵是一群有崇高理想，為了追求美好未來不惜犧牲自己寶貴生命的自由軍。透過他們的熱情與真誠，我們似乎看到了一線希望。

只是，後續作品顯示，作者的革命熱忱有限，似乎只有持續不到兩年的時間。1831 至 1832 年間，巴爾札克搖身一變，變成一位激進的正統派。除了在報章雜誌裡發表多篇政治文章（如：“*Lettres sur Paris*”等），²⁸ 宣傳他個人的治國理念之外，也數次向保皇派毛遂自薦，表示願意為其效力，代表出任競選康布雷（*Cambrai*）和杜爾市（*Tours*）的市議員（*député*）。

只是，很顯然地，自由「選舉」的本質與保守派的立場互相衝突。因此，很快地，巴爾札克質疑起選舉制度的可靠度。並在幾年後的《人間喜劇》〈前言〉（*Avant-propos*, 1841）一文中，清楚地否定這個制度。他表示，選舉的結果與當選人的能力與責任感沒有絕對的關係。而且，更危險的是，在法律的庇護之下，當選人很容易變得自大，甚至獨裁，進而威脅整個國家社會的安危。因此，巴爾札克表示，一個國家要穩健，領導人要符合社會期望，一個強而有力的「宗教」（*la Religion*）和一個體制完善的「封建制度」（*la Monarchie*）是有其必要性的。他特別以大寫的方式清楚強調這兩個原則：

²⁸ 所有相關文章皆收錄在 Honoré de Balzac, *Œuvres Diverses*, t. II (Paris: Pléiade, 1996), 867-981.

我在兩個永恆真理透露出的微光裡寫作：宗教和封建制度。近來的社會事件顯示出它們的必要性，這也是所有理智、思路清晰的作家需為國家努力的方向。²⁹

從這段自白裡，我們發現，巴爾札克政治立場的「轉變」是一番謹慎思考後的結果。對富有強烈使命感的他而言，寫作除了可以記錄社會現況、將人類與環境間複雜的互動關係記錄下來之外，還更該有一層深度的意義：要具有「教育者」(instituteur)的功能。換句話說，一個好的作家不僅要能取悅讀者，更要能謹慎看待自己的角色和職責，將寫作視為一個可以引導人民走向光明未來的「工具」。接著，他引述保守派思想家路易·伯那得(Louis de Bonald)對「作家」所下的定義，並將其視為自己努力的目標：

一個作家在倫理及政治上都要有明確的見解，他必需將自己視為教育者的角色，因為人民不需要一個會令人感到疑慮不安的領導人。³⁰

那麼，「宗教」和「封建制度」究竟有何重要性？為什麼變成保守派的巴爾札克會將這兩原則相提並論，並將其視為他個人的寫作準則？〈前言〉裡有我們想要的答案：「基督教，特別是天主教，是〔……〕一套可以抑制人們墮落思想的完善制度，是社會秩序最重要的一個環節。」³¹因此，很清楚的，「宗教」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有「抑制」人民的力量，它是維持「社會秩序」(l'Ordre Social)的重要靈魂。而一套清楚的「社會秩序」又是「封建制度」的主要基底。因此，若沒有「宗教」，「封建

²⁹ 筆者譯自 Honoré de Balzac, *La Comédie humaine*, t. I (Paris: Pléiade, 1976), 13.

³⁰ 筆者譯自 Honoré de Balzac, *La Comédie humaine*, t. I (Paris: Pléiade, 1976), 12.

³¹ 筆者譯自 Honoré de Balzac, *La Comédie humaine*, t. I (Paris: Pléiade, 1976), 13.

制度」無法正常運行。唯有在這兩者相輔相成的情況下，社會才會安穩，法國未來才有希望。

那麼，什麼樣的運作才能稱為有「秩序」呢？在舊制社會裡，法國社會分為三階層，又稱「三秩序」(les Trois Ordres)，這和我們早先提到的「社會三階論」是同一個概念。各個階層人種自出生即依血緣、身份的差異負責不同的工作，代代相傳。這個制度雖然在某種程度上有其不公平的地方，但卻也維持了幾世紀的和平。因此，看了一個保守派作家的眼裡，這個飽受批評的舊制度不免有其不可抹滅的價值。而「宗教」，正是可以讓這制度維持幾百年「秩序」的關鍵。也因如此，「宗教」的重要性無可厚非。它是唯一一個可以讓底層百姓摒除非份思想，讓貴族、國王得以在穩定的條件下善盡自己的責任與義務的方法。

如此看來，巴爾札克之所以會放棄共和理想，很有可能是因為他無法在一個缺乏「社會秩序」的民主制度裡看到一個讓百姓安分守己，讓國家社會穩定富強的未來。因此，「社會秩序」的概念是促使巴爾札克轉向支持保守派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榮爵公爵夫人》(*La duchesse de Langeais*, 1834) 裡，他清楚地解釋道：

和諧是帶著詩意的秩序，人民迫切需要秩序。若要以單一字詞來表示事物間的契合(統一性)，不就只能使用最簡單的「秩序」一詞嗎？³²

巴爾札克之所以支持貴族制度，並不是因為他贊同特權制度，也不是全然因為他個人對貴族有種特別的情感，而是因為他認為「安定」(stabilité)、有「秩序」的生活才是人民衷心的渴望。

³² 筆者譯自 Honoré de Balzac, *La Comédie humaine*, t. V (Paris: Pléiade, 1977), 925.

因此，我們很難想像，在對自己的工作有著極高的要求，在對社會政治問題有著強烈個人見解的情況下，巴爾札克用盡一生精力所創作的只有「哀悼死者」一消極功能。巴爾札克真的已不再對貴族抱持著任何希望了嗎？貴族真的已是過去式了嗎？很明顯的，這論點和知名的巴氏文學權威 Pierre Barbéris 的研究成果不同調。在 Pierre Barbéris 看來，隨著作品及作家的成長，貴族問題在《人間喜劇》裡扮演著一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這絕對不只和作家的私人生活經驗有關，這或許和作者一直表現出來的政治野心有關係。的確，巴爾札克在貴族問題上努力不懈的鑽研讓我們合理地相信，他的終極目標，無不是想藉由小說、文章來達到「重組貴族階級」的理想，讓他的作品及付出能夠在歷史上獲得一定的肯定：

隨著作品 [《人間喜劇》] 的發展，貴族角色日顯重要。在婚姻及幻想的雙重影響之下，巴爾札克加強了貴族的重要性。這是一個巴爾札克費盡一切心力想要重組的社會階級。³³

因此，我們相信，巴爾札克筆下的貴族是身負重責大任的，他們代表的不僅是他們所屬的社會階級，更是整個階級的精神象徵：與社會穩定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透過他們，作者筆下混亂的社會秩序似乎找到了答案。的確，大革命後的金錢橫行、人性的喪失及司法腐敗不正是一一說明了「社會秩序」的急迫性嗎？

就像描寫社會那樣，除了簡單及生理的描寫外，巴爾札克還給予了貴族一個神話般的形象。這形象是有其任務的，唯有透過它，真實的述敘與描寫才有其意義。³⁴

³³ 筆者譯自 Pierre Barbéris, *Le monde de Balzac* (Paris: Arthaud, 1973), 167.

³⁴ 筆者譯自 Pierre Barbéris, *Balzac: une mythologie réaliste* (Paris: Larousse université, 1971), 178.

然而，又如同恩格斯的觀察，在某些小說片段裡，巴爾札克的「尖刻」與「辛辣」的確是個不爭的事實（如：《榮爵公爵夫人》、《古玩陳列室》〔*Le cabinet des Antiques*、《幻滅》〔*Illusions perdues*）等）。那麼，我們要如何來看待這個問題才不會誤解作者的本意？

不同於其它小說常是針對某些貴族的個人行為做批評，在《榮爵公爵夫人》裡，巴爾札克清楚地表示，公爵夫人是她所屬的社會階級的最佳代表人（*le type le plus complet*），她錯誤的行為表現出的是「整個」貴族階級的普遍問題。因此，作者這裡指責的對象是「整個」特權階級，他的失望與不滿反映在他嚴厲的措詞上：「一個被低估的貴族像是一個懶惰的國王，一個穿著襯裙的丈夫，是無能且無用的。」³⁵

另外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發現，在巴爾札克眼中，貴族最不可饒恕的錯誤，不是他們不可一世的態度，而是他們疏忽了自己應盡的社會責任。他們輕浮的態度造就了底層百姓起身反抗的機會，讓原本穩如泰山的「社會秩序」面臨了終結的危機：

聖日耳曼區³⁶寧願接受挫敗也不願意去正視他們與生俱來的責任，其實，他們是有可能可以很輕鬆地延續他們的任務的。只是，他們必須和英國貴族一樣，虛心接受並及時體悟同一字詞可以有不同的解釋，相同的想法可以有不同的詮釋。政治生活條件也是可以在結構基礎不受任何影響的情況下，完全改變它外在形式的。³⁷

³⁵ 筆者譯自 Honoré de Balzac, *La Comédie humaine*, t. V (Paris: Pléiade, 1977), 928.

³⁶ 巴黎的一區，現今的巴黎七區。曾經是巴黎最豪華高級的地段，居民多以家族歷史悠久的貴族為主。

³⁷ 筆者譯自 Honoré de Balzac, *La Comédie humaine*, t. V (Paris: Pléiade, 1977), 927.

從這段話裡，我們發現，在指責之餘，巴爾扎克似乎也分享了他對貴族問題的看法。他認為，法國貴族之所以挫敗，是因為他們沒有及時效法英國貴族，勇敢面對問題，學習適應新社會的需求。因此，他強調，貴族不應再停留在過去的特權時代，以高姿態壓榨底層人民百姓。他們應要以全新的方式來領導人民，以實質才幹來重新說服人民，以期建立一套雙贏互利，可長可久的社會制度。換句話說，貴族是有可能繼續他們領導人的角色的。只是，前提是，他們必需要有所改變，要懂得放下身段，放棄「血統論」，改以較實際、較符合人民需求的方式來達到目標：「可以確定的是，今天的君王，是人民。」³⁸

當然，「中產階級」出身，習慣以「藝術家」身份自居的巴爾扎克也不忘為自己所屬的社會階層發聲。他除了一再強調藝術家、科學家及中產階級的「實力」(force réelle)及可能對社會造成的影響力之外，他也勸告傳統貴族要向這新興階級虛心請教：「藝術、科學及金錢形成的社會三角形，是權能的根基，是新貴族階級要努力的方向。」³⁹總之，在如此一個惡劣的環境下，懂得以聰明才智 (preuve d'intelligence) 做出適當的改變才是上策：「若要想保住一國之首的地位，不是應要在本質及思想上保持得宜的行為舉止嗎？這樣才能說服勞動人口。」⁴⁰

因此，難以否認地，巴爾扎克對傳統貴族仍保有一定的信心。如同 Pierre Barbéris 的說法，他寧可把他們「神話化」，也不願把他們視為「死者」，去「哀悼」他們。會如此的堅持，是因為巴爾扎克知道，除了傳統貴族的潛能及中產階級的實力之外，法國社會是無其它選擇的。帶頭反

³⁸ 筆者譯自 Honoré de Balzac, *La Comédie humaine*, t. V (Paris: Pléiade, 1977), 928.

³⁹ 筆者譯自 Honoré de Balzac, *La Comédie humaine*, t. V (Paris: Pléiade, 1977), 928.

⁴⁰ 筆者譯自 Honoré de Balzac, *La Comédie humaine*, t. V (Paris: Pléiade, 1977), 928.

抗政權的百姓、群眾 (peuple, masse)⁴¹除了會製造混亂外，是無法擔當大局的：

平等有可能是一種權力，但任何人力都無法將之改變為事實的。
為了法國的幸福著想，我們必需推廣這個想法。讓最愚蠢的百姓
繼續去揭露這和諧政權的種種益處吧！⁴²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為巴爾札克嚴厲的批評找到一個合理的解釋。他之所以會對貴族嚴詞厲色、譏笑他們「無能」、「無用」，除了是想給貴族一記當頭棒喝的打擊之外，似乎也是想激勵他們，「重組」這個社會力量：

只佔人口近千分之一的貴族，應該要像過去那樣，累積實力，在這緊急的危機裡，匯集和廣大民眾同等的力量，去抵抗他們的反抗。⁴³

最後，我們還想了解的是，巴氏貴族是否都真如恩格斯所言，是「不配有更好命運的人」？若我們繼續以《榮爵公爵夫人》為例，我們會發現，公爵夫人悲慘的結果似乎印證了恩格斯的說法：在百般踐踏情人後，夫人情不自禁地墜入情網，為了乞求原諒，她顧不得自己高貴的身份，將情事公諸於世，成了上流社會人人避而遠之的醜聞。最後，在等不到情人正面回應的情況下，夫人被迫遠離巴黎，一個人越過國境，躲到一偏遠的西班牙修道院裡。雖然，後悔莫及的情人最終透過種種管道找到了她，但是，夫人最終仍是無法和心上人有情人終成眷屬。

⁴¹ 作者喜歡使用具貶意的「群眾」(masses)一詞來描寫百姓，似乎是想藉此強調他們的雜亂與欠缺判斷力。在社會學裡，「群眾」的相反詞是「精英」(élite)、有能力 (compétence) 的人。

⁴² 筆者譯自 Honoré de Balzac, *La Comédie humaine*, t. V (Paris: Pléiade, 1977), 925.

⁴³ 筆者譯自 Honoré de Balzac, *La Comédie humaine*, t. V (Paris: Pléiade, 1977), 928.

因此，從故事表面的發展看起來，公爵夫人的確是得到了應有的「懲罰」，她過去犯下的錯誤讓她無法擁抱幸福愛情。然而，若仔細觀察，我們會發現，事實真相似乎並沒有那麼簡單，在公爵夫人轉變成「修女」的背後似乎隱藏著一個作者深沉的算計。

除了自恃甚高、傲慢不講理等問題外，公爵夫人最嚴重的問題不外乎是「宗教」問題。從她與情人幾次的談話中，我們不難發現，雖然夫人常把宗教道義掛嘴邊，但事實上，她是個不相信上帝的人：

宗教信仰只維持了三個月。時間一到，被自己不斷重覆的言論弄得煩躁不堪的公爵夫人將上帝的手腳捆綁起來，送給她的情人。⁴⁴

對保守派作家巴爾扎克而言，這是今日貴族面臨的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因為，這不是一件單純的宗教問題，而是一個攸關「社會秩序」的問題：傳統貴族出身的公爵夫人若連維持社會穩定的宗教教義都解釋不清，那麼，貴族和平民究竟有什麼差別？後者為什麼要盡心盡力地為前者工作？因此，「宗教問題」變成公爵夫人與「新貴族」情人（拿破崙貴族，*la noblesse napoléonienne*）間一個很重要的拉鋸戰。夫人試著讓情人屈服於宗教的力量，讓她可以永遠以「公爵夫人」的身份自居，然而，自相矛盾的她卻打從心底不相信上帝。於是，在幾番交手之後，夫人漸漸不再是一位高高在上的「公爵夫人」，失去宗教「抑制」人民非分思想力量的她，在情人眼裡，只是一位再「平凡」不過的普通女子。

因此，公信力遭受打擊的公爵夫人變成「修女」是很合乎邏輯的。因為，唯有歸依上帝，她才能找回自己的價值、她「高貴」身份才有說服力。「修女」的身份讓她洗淨了先前的錯誤，讓她不再是一位名聲敗壞的女子，而成了上帝身旁的天使。因此，貴族終於重拾了他「高人一等」

⁴⁴ 筆者譯自 Honoré de Balzac, *La Comédie humaine*, t. V (Paris: Pléiade, 1977), 973.

的地位，並得到了最有力的支持。如此一個算計清楚地記載在夫人留給情人的遺書中：

啊！我對可以將自以為偉大的您踩在腳下感到一股深沉的快感，我可以用柔弱天使冷靜且令人安心的微笑來羞辱您。我依偎在上帝的腳邊，以祂的名義、權責和力量來監視人們。⁴⁵

因此，夫人的命運沒有表面上看起來那樣地悲慘。值得提醒的是，她生命終結的原因是「自殺」。這意謂著貴族最終選擇放棄愛情，決定不要再次因為愛情而拋棄自己的權威與地位。

總結以上分析，我們發現，恩格斯的說法似乎有其不足的地方。《人間喜劇》或許有「嘲諷」貴族的地方，但是，它不可能有「同情」的口氣。因為，在巴爾扎克眼裡，貴族、社會秩序是國家未來的唯一希望。他的「嘲諷」，無不是希望能早日「重組」支離破碎的貴族，讓他們能齊心面對現實，讓社會運作能回歸正常。

那麼，為什麼會有如此多的中國學者引述恩格斯的論點呢？我們或許可以在蔣芳的《巴爾扎克在中國》一書裡找到答案。根據蔣芳的論述，巴爾扎克的引進是因為其作品與某些哲學家的理論相輔相成。其中，最明顯的例子，要屬恩格斯及其好友馬克斯（Karl Heinrich Marx, 1818-1883）：

該時期 [新中國成立以前] 聚焦巴爾扎克的現實主義成就，與其說是國內學人把握到了巴氏研究的主流，不如說是引進了國外經典論述的精要 [.....] 恩格斯指示：巴爾扎克，我認為他是比過去、現在、未來的一切左拉都要偉大得多的現實主義大師，他在

⁴⁵ 筆者譯自 Honoré de Balzac, *La Comédie humaine*, t. V (Paris: Pléiade, 1977), 1028.

《人間喜劇》裡給我們提供了一部法國「社會」，特別是「上流社會」的卓越的現實主義歷史 [.....]⁴⁶

因此，在無法反駁恩格斯、馬克斯理論的情況下，中國學者往往並不是為了巴爾扎克而研究巴爾扎克，而是試著在其作品中找尋可以印證哲學家們「經典論述」⁴⁷的例證：

眾所周知，自恩格斯《致瑪哈克奈斯》介紹到中國後，逝去的幾十年，國內評論巴爾扎克一直在恩格斯的經典論述下徘徊著。許多觀點的形成、諸多論文的發表最終成了它的注腳。⁴⁸

只是，值得提醒的是，這篇被眾多學者視為「經典論述」的信件，全長只有 784 個英文字，裡頭談到巴爾扎克文學的部分也實在有限（僅一段落）。

因此，在社會思想橫行的條件下，其它不同的看法很難獲得共鳴。巴爾扎克的作品常被詮釋為社會階級的鬥爭，他的社會問題寫實已不像是 Pierre Barbéris 解釋的那樣，為了反映出貴族的重要性，而是讓他成為了「社會思想」的最佳代言人：

對於《人間喜劇》主題的研究，大部分學者依然將其框定在「封建貴族階級的衰亡史」、「資產階級的發跡史」和「人與人之間的金錢關係」等層面，即便有些差異，也只是對作品「反映」和「揭露」的矛盾性進行了不同說明。這種狀況的形成，對於我們透徹理解恩格斯的論述，深入發掘《人間喜劇》的社會歷史意義無疑

⁴⁶ 蔣芳，《巴爾扎克在中國》，頁 63-64。

⁴⁷ 就連王進駒教授也不例外，其文章中也有引述到恩格斯的這段談話。

⁴⁸ 蔣芳，《巴爾扎克在中國》，頁 175。

帶來了好處，但也使部分巴學者開拓新的思維受到了一定的束縛。⁴⁹

如蔣芳所言，貴族與中產階級的鬥爭的確是《人間喜劇》裡相當重要的一個議題。但若因此就將《人間喜劇》的 137 部作品全視為對權貴階級的批判，這似乎顯得有些過於簡單。對巴爾扎克而言，貴族的衰敗是個不爭的事實，但是，這牽扯的問題很廣，是整個社會結構的問題。究竟要如何在這個失去「秩序」的社會裡重建一套可行的制度，讓貴族意識到問題並正視它，這似乎才是作者寫作的目標之一。

最後，在最末章節裡，我們將就「貴族問題」的呈現來討論《紅樓夢》與《人間喜劇》的關係。

參、《紅樓夢》與《人間喜劇》中的貴族問題

在《人間喜劇》被普遍視為「輓歌」文學，作品裡批判上流社會的段落常被無限地放大討論後，一些比較文學的相關研究也開始朝此方向發展。其中，最常討論的主題即是《人間喜劇》與《紅樓夢》反映「封建社會崩潰前夕」⁵⁰的比較。支持此類說法的學者認為，《紅樓夢》和《人間喜劇》有異曲同工之妙，都力在呈現貴族腐敗、無法挽救的一面，兩部作品不約而同地道出東西兩方封建社會的末期：

⁴⁹ 蔣芳，《巴爾扎克在中國》，頁 123。

⁵⁰ 王進駒，〈曹雪芹“不像”巴爾扎克——論用批判現實主義評析《紅樓夢》〉，《紅樓夢學刊》，期 3（2000 年），頁 171。

正如巴爾扎克為他心愛的貴族唱了一曲無盡的輓歌一樣，曹雪芹也為他心愛的貴族、神迷的貴族生活以及那一去不復返的煌煌繁華、赫赫富貴唱了一曲深情的輓歌。⁵¹

只是，這樣一個說法衍生出幾個問題。第一，當然就是我們才剛討論過的，從小說內容來看，「輓歌」一詞無法清楚解釋《人間喜劇》的創作理念。第二，從歷史角度來看，就如王進駒教授的提醒，中法兩國貴族是在完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走入歷史的，若要過度將這兩種社會現象相提並論，似乎缺乏說服力。最後，若結合第一章節裡談到的「社會結構」的不同，我們會發現，所謂的「貴族問題」，在這兩本小說裡的意義全然不同。

巴爾扎克生於後革命年代，在他不算漫長的五十二年生涯中（1799-1851），他經歷了法國近代史的五個重大階段：第一共和（*Première République*, 1792-1804）、第一帝國（*Premier Empire*, 1804-1814）、復辟時期（*Restauration*, 1814-1830）、七月王朝（*Monarchie de juillet*, 1830）及第二共和（*Deuxième République*, 1848-1852），也親眼見證了兩次激烈的人民暴動：1830年的七月革命及1848年的二次大革命。這些過於常人的經驗讓這位具政治野心的年輕作家有了深層的思考。

因此，雖然舊制社會的腐敗是個不爭的事實，然而，舊制社會及貴族制度所建立的「社會秩序」卻是唯一可以讓社會正常運作的方法。在此前提之下，巴爾扎克想強調的，當然不是權貴階級的特殊性，而是貴族的「實質」角色及他們在政治及地方行政裡難以被取代的重要性：

⁵¹ 張毅蓉，〈“巴爾扎克現象”與《紅樓夢》的輓歌情調〉，《南通師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卷16期2（2000年），頁51。

巴爾札克不是沒有看到貴族的問題，但是他希望在修正整體社會意識形態的背景下，貴族可以超越貴族問題。因此，重要的不是貴族本身的問題，而是他們握有的權利，一個可以讓他們在政治及地方行政裡扮演的實質權。⁵²

如此一個認知或許和我們先前提到的「社會三階論」有緊密關係。數百年來，貴族階級在法國社會裡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他們界於國王與人民之間，對上對下都有其應盡的義務與責任。而且，他們世代輪替的方式也在無形間穩定了他們的社會角色，讓他們變成社會組成缺一不可的主要力量之一。因此，若要一夕間突然將貴族階級從這個穩固的社會金字塔（*pyramide sociale*）裡除去，那麼，法國社會勢必得盡快找出一個可以取代傳統貴族的方法。因此，雖然人民的反抗、貴族的推翻都是鐵的事實，但是，法國社會似乎無法因此就完全拋棄一切舊有的規範，盲目地往共和主義邁進。這樣一個不符合西方社會結構原理的結果只會造成社會的大亂，人民的無所適從：

某個程度來看，貴族階級像是社會的思考中心，就像中產階級是策劃機關、平民階級是完成任務的勞動力一樣。⁵³

因此，很清楚地，《人間喜劇》裡的「貴族問題」不是單純某個特定階級的問題，而是一個攸關整體社會結構的問題。究竟要如何才能在保有舊制度的規範與價值的同時，重新建造一個符合人民期許的新社會？這似乎是《人間喜劇》作者不斷鑽研、思考的問題。

至於曹雪芹他的生長背景則完全不同。他的一生與清朝的「康乾盛世」（1681-1796）重疊。他生於康熙 1724 年，逝於 1763 或 1764 年。因

⁵² 筆者譯自 Pierre Barbéris, *Balzac: une mythologie réaliste* (Paris: Larousse université, 1971), 179.

⁵³ 筆者譯自 Honoré de Balzac, *La Comédie humaine*, t. V (Paris: Pléiade, 1977), 925.

此，從小生長在一個穩固建全的封建社會裡的他，從未經歷過革命的衝擊，從未見證過社會環境的巨大變遷。也因如此，我們贊同王進駒教授的理論，曹雪芹是很難和巴爾扎克一樣，對社會政治的動盪不安感到極度的憂心及掛念。即使有，他們的狀況也應該非常不同。

的確，不同於巴爾扎克，在曹雪芹的社會裡，人民沒有暴動，貴族沒有受到威脅，社會結構沒有受到挑戰，在中央集權的統治之下，社會的運作是那麼地亂中有序。大戶人家的霸氣凌人、胡塗官員的為非做歹、皇上對下屬的生死操弄權，這一切看起來都是那麼地自然！因此，在沒有任何徵兆讓人可以聯想到「封建制度必然崩潰」的情況下，曹雪芹是很難像許多學者宣稱地那樣，預測封建制度的瓦解，進而追求理想共和的：

曹雪芹生活的時代正是清王朝的盛世 [.....], 根本不能和巴爾扎克的時代相比。不能因為康乾盛世隱含有衰的矛盾因素，就不願實際地斷定為“封建社會崩潰前夕” [.....]。⁵⁴

那麼，該如何解釋《紅樓夢》裡對上流社會諸多的批評與指責呢？

胡適、俞平伯等人試著從曹雪芹坎坷的人生經歷找答案，認為作者很有可能是想藉由文筆來抒發自己家道中落的傷感。只是，若真是如此的話，那麼，姑且不論這樣一個類似於「自傳」(autobiographie)的方式與巴爾扎克的寫作角度有相當大的差異，兩位作家的寫作心態也是南轅北轍：前者重在個人情緒的抒發，後者則是在社會重建的思考。更何況，如同王教授提醒，倘若曹雪芹真可以從自己家族落敗的經驗裡取得一些

⁵⁴ 王進駒，〈曹雪芹“不像”巴爾扎克——論用批判現實主義評析《紅樓夢》〉，《紅樓夢學刊》期3（2000年），頁171。

寫作靈感，從未聽聞、接觸過其它社會制度形態的他也不太可能會將這些想法擴展到對整個制度、整個朝代、甚至整個中國歷史的抨擊：

即使他 [曹雪芹] 從自己家庭的衰敗過程中產生盛衰之感，那也是一個家庭的衰敗，或聯想到許多貴族家庭的敗亡，而不可能是整個階級和封建社會的崩潰和滅亡。因為曹雪芹不可能有今人所具有的唯物史觀的階級觀點、社會發展階段論等觀點 [……]。⁵⁵

此外，不同於《人間喜劇》表現出的政治不確定性，《紅樓夢》不乏對封建穩固力量的說明。其中，最清楚的，要屬有關賈府衰亡的解釋。在第一百五回中，作者表示，造成賈家權勢終結的主要原因是「抄家」，而這強大不可抗拒的力量正是「皇權」的象徵。換句話說，造成賈府衰亡的因為是封建制度本身，而不是外來的力量。這與《人間喜劇》的平民暴動、貴族沒落、中產階級興起等問題截然不同。因此，賈府的衰敗不但無法證明「封建制度必然崩潰的規律與趨勢」，反而間接證明了中國封建體制的穩健與完善。

我們尚可在書末的戲劇轉折處觀察到同一思考邏輯。第一百十九回，在賈蘭與賈寶玉雙雙中舉後，皇帝龍心大悅，轉對賈府的衰變感到惋惜，於是，看在「賈妃」（賈蘭與賈寶玉的姐姐）及「賈氏功勛」⁵⁶的份上，不但下令免了賈家一家大小的罪行、歸還其抄家的財物，還恢復了他們的襲爵權及官職。因此，很明顯的，國家大權全掌握於皇帝一人手中，賈府的滅亡與重生不過是歷史上一件微不足道的例證，作者或讀者是不可能可以從中體悟到封建制度的瓦解的：

⁵⁵ 王進駒，〈曹雪芹“不像”巴爾扎克——論用批判現實主義評析《紅樓夢》〉，《紅樓夢學刊》期3（2000年），頁171-172。

⁵⁶ 曹雪芹著，蔡江義注，《紅樓夢》（浙江：浙江文藝出版社，1996年），頁1590。

即使許多單個的賈府衰敗了，但只要整個經濟基礎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那麼作為無數賈府一樣性質的貴族地主家族組合體的地主階級以及他們的總代表——封建皇權也不會滅亡，作為封建社會的性質也不可能改變。⁵⁷

另外，林黛玉的慘死、賈寶玉的婚姻、薛寶釵的冒名下嫁不也都間接證明了封建家庭不可抗拒的力量？在賈母、王夫人及王熙鳳等人的掌控之下，自由愛情、理想生活、獨立自主的人生似乎是過於不切實際的想法。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賈府的內部結構呼應了外在的社會條件：無論是賈家或是整個中國社會，階級制度的劃分都非常地鮮明，權力都掌控在少數人的手中。賈家一家之主——賈母（賈太君）——猶如一國之君，其大小意願就像「聖旨」一樣地被遵從，不僅大觀園裡那群清純的少男少女不敢任意妄為，就連她襲爵當官的兒子也不敢違背其旨意。在第三十三回裡，賈母怒斥兒子賈政的段落令人印象深刻。在她的強權干預之下，賈政不得不放棄對兒子賈寶玉的管教權：

「老太太來了」。一句話未了，只聽窗外顛巍巍的聲氣說道：「先打死我，再打死他[寶玉]，豈不乾淨了！」賈政見他母親來了，又急又痛，連忙迎接出來，只見賈母扶著丫頭，喘吁吁的走來。賈政上前躬身陪笑道：「大暑熱天，母親有何生氣親自走來？有話只該叫了兒子進去吩咐。」賈母聽說，便止住步喘息一回，厲聲說道：「你原來是和我說話！我倒有話吩咐，只是可憐我一生沒養個好兒子，卻教我和誰說去！」⁵⁸

⁵⁷ 王進駒，〈曹雪芹“不像”巴爾扎克——論用批判現實主義評析《紅樓夢》〉，《紅樓夢學刊》期3，頁172。

⁵⁸ 曹雪芹著，蔡江義注，《紅樓夢》，頁431。

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賈母要對賈寶玉及兒孫們不受規範的行為負責。而這「兒臣之錯，君主之失」的結果也確實反映在賈母身上。在第一百六回中，在得知大勢已去之後，賈母悲傷地拿香跪拜，希望佛祖能原諒她的兒孫，由她一人獨自承擔這一切的過失：

皇天菩薩在上，我賈門史氏，虔誠禱告，求菩薩慈悲。我賈門數世以來，不敢行凶霸道。我幫夫助子，雖不能為善，亦不敢作惡。必是後輩兒孫驕侈暴佚，暴殄天物，以致合府抄檢。現在兒孫監禁，自然凶多吉少，皆由我一人罪孽，不教兒孫，所以至此。我今即求皇天保佑：在監逢凶化吉，有病的早早安身。總有合家罪孽，情願一人承當，只求饒恕兒孫。若皇天見憐，念我虔誠，早早賜我一死，寬免兒孫之罪。⁵⁹

在這個「權力」與「責任」分不開的關係裡，讀者不難認出封建體制的基本結構。因此，賈母在第一百十回的壽終正寢、賈家在第一百十九回的重返政權似乎透露著賈家美好新未來的訊息。而這從滅亡到重生的轉變似乎也暗喻著中國封建制度周而復始、循環不息的姿態：

事實上，結局對於皇上的格外開恩，使賈家因此而得復興的機會，等於再一次的對皇帝的歌功頌德。也使得打破中國小說傳統「大團圓」結局的《紅樓夢》又走回原來的路數，削弱了前八十回營造的「末世」光景。⁶⁰

因此，若要因為《紅樓夢》有涉及「貴族問題」就不顧一切將其解釋為貴族「輓歌」的代表作，似乎顯得有些不合理。因為，很明顯的，《紅

⁵⁹ 曹雪芹著，蔡江義注，《紅樓夢》，頁 1432。

⁶⁰ 舒曼麗，《紅樓夢四大家族與金陵十二釵》（臺北：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頁 23。

樓夢》裡的「貴族問題」講的不是整個封建制度瓦解的問題，而是狹義的貴族階級（操守）問題。小說裡的貴族尚不是個「死者」，何來的「哀悼」？讀者看到的只是貴族貪汙、腐敗的問題，「社會結構」自始至尾根本就不是個「問題」。《紅樓夢》裡的「貴族問題」不過是一個每一種社會類型都會有的社會問題（民主社會亦有它的問題），與社會發展、環境變遷毫無關係。

結論

不能否認的，曹雪芹和巴爾扎克在寫作上的確是有幾個共通點，《紅樓夢》與《人間喜劇》確實都是以「貴族」做為思考重心，只是，在這看似類似的動機下，卻隱藏著兩套完全不同的思考模式，而這不同也連帶著反映出中西兩方在貴族定義與運作上的差異：在西方社會裡，貴族階級有實質的社會角色，他們的存在與社會的穩定息息相關；在中國，貴族毫無實權，一切只能任由中央擺布。因此，在《人間喜劇》裡，在社會環境巨大變遷的影響之下，巴爾扎克提出了「社會秩序」的觀點，希望能藉此宣揚貴族的重要性。反觀《紅樓夢》，中國貴族沒有實質的價值，他們的取代性高，只能依附在皇權之下。

因此，雖然「貴族問題」同時給了曹雪芹和巴爾扎克創作靈感，但是，不同的背景反映出不同的社會形態。在巴爾扎克的作品裡，要如何讓社會繼續穩定地發展下去是迫在眉梢的問題。反觀《紅樓夢》，曹雪芹談的不是封建體制的落幕、階級制度的瓦解，而是貴族階級的腐敗。亦是說，這個「貴族問題」不是「制度」的問題，而是「社會風氣」的問題。換句話說，讓這兩位作家感到「憂心」的問題本質大不同。當然，他們找尋出路的方向也就截然不同：巴爾扎克試著以現實層面向世人解

釋「貴族」的重要性；至於曹雪芹，只能透過「皇上」的法外開恩在小說裡注入一線生機。

從以上這些差別，我們清楚得知，巴氏文學的複雜度無法讓我們用「輓歌」一詞簡單帶過，因為，法國社會是無法放棄貴族制度的！此外，基於社會結構、政治背景等原因，我們也無法認同《紅樓夢》的文學性質與《人間喜劇》完全相似。《紅樓夢》裡的確有「暗喻」上流社會腐敗的段落，但是，這與貴族階級的衰敗、封建制度的瓦解毫無關係。

因此，我們不能因為《紅樓夢》與《人間喜劇》有幾個相似處，就不顧一切地表示曹雪芹的寫作心情、寫作動機與巴爾扎克完全相同。就如同眾學者一再推崇的一樣，兩位作家之所以偉大之處，無不在於他們「寫實」的功力，就暫且不論這樣一個觀點是否完全正確，可以確定的是，「現實社會」在小說裡佔有一定的份量。也因此，曹雪芹的思想是不可能超越他的世人百餘年，中國的封建社會是不可能終止在十八世紀的。所謂的自由民主社會不過是隨著西方社會入侵而引進的新觀念，中國人民自始至尾只有扮演著被動的角色。因此，曹雪芹至多只能藉著大觀園裡的青年男女傾訴他個人的理想世界，但是，他清楚明白，大觀園外的醜陋世界是真實存在，無法否認的（這也是為什麼大觀園裡的少男少女在離開了這潔淨家園後總是避不開淒慘下場的主要原因之一）。

最後，我們想強調的是，雖然《紅樓夢》與《人間喜劇》的寫作背景不完全雷同，但是，兩位作者的用心卻是可以相互媲美的：在政壇失意的巴爾扎克藉由文筆來盡個人的一份心力，在某種程度上，不是可以和曹雪芹因為政治因素（文字獄）無法坦率地點出社會問題，反藉由大觀園的理想世界來一表擔憂的心情是相類似的嗎？因為他們的投入及付出，「小說」多了一個讓人反省社會國家的實質功能。

徵引書目

(一) 古籍

清 Qing·曹雪芹 Cao Xueqin 著，蔡江義 Cai Jiangyi 注，《紅樓夢》*Honglou meng*，浙江[Zhejiang]：浙江文藝出版社[Zhejiang wenyi chubanshe]，1996年。

(二) 近人編輯、論著

王進駒 Wang Jinju，〈曹雪芹“不像”巴爾扎克——論用批判現實主義評析《紅樓夢》〉“Cao Xueqin buxiang Balzac: lun yong pipan xianshi zhuyi pingxi *Honglou meng*”，《紅樓夢學刊》[*Honglou meng xuekan*]，期3[no. 3]，2000年，頁170-184。

王寶琴 Wang Baoqin，〈《儒林外史》與《人間喜劇》之比較〉“Rulin waishi yu Renjian xiju zhi bijiao”，《青海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Qinghai minzu xueyuan xuebao (shehui kexue ban)*]，卷32期1[vol. 32, no. 1]，2006年，頁129-131。

朱娟輝 Zhu Juanhui，〈《聊齋志異》與《人間喜劇》商人形象之比較研究〉“Liaozhai zhiyi yu Renjian xiju shangren xingxiang zhi bijiao”，《雲夢學刊》[*Yunmeng xuekan*]，卷31期4[vol. 31, no. 4]，2010年7月，頁113-115。

李希凡 Li Xifan、藍翎 Lan Ling，〈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Guanyu *Honglou meng jianlun ji qita*”，《紅樓夢評論集》*Honglou meng pinglun ji*，北京[Beijing]：作家出版社[Zuojia chubanshe]，1957年，頁1-20。

李新麗 Li Xinli，〈黃金枷鎖下兩個女人的悲劇：曹七巧與歐也妮形象的比較〉“Huangjin jiasuo xia liangge nüren de beiju Cao Qiqiao yu Ouyeni

xingxiang de bijiao”，《合肥教育學院學報》[*Hefei jiaoyu xueyuan xuebao*]，期 1[no. 1]，1996 年。

李群英 Li Qunying，〈巴爾扎克與曹雪芹創作思想比較論〉“Balzac yu Cao Xueqin chuangzuo sixiang bijiao lun”，《社科縱橫》[*Sheke zongheng*]，卷 22 期 10[vol. 22, no. 10]，2007 年，頁 99-101。

張明慧 Zhang Minghui，〈熱炭寒冰總酸辛——鮑賽昂夫人和薛寶釵婚戀悲劇淺識〉“Retan hanbing zong suanxin: Baosaiang furen han Xue Baochai hunlian beiju qianshi”，《南通師專學報》[*Natong shihzhan xuebao*]，卷 9 期 3[vol. 9, no. 3]，1993 年，頁 29-34。

——，〈才自清明志自高，出於末世運偏消——鮑賽昂夫人和薛寶釵婚戀悲劇淺識〉“Caizi qingming zhizigao, chuyu moshi yun pianxiao: Baosaiang furen han Xue Baochai hunlian beiju qianshi”，《鹽城師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Yancheng shizhan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期 1[no. 1]，1994 年，頁 14-26。

——，〈金錢砒碼下的敗將，宗法祭壇上的犧牲——鮑賽昂夫人和薛寶釵婚戀悲劇淺識〉“Jinqian fama xia de baijiang, zongfa jitan shang de xisheng: Baosaiang furen han Xue Baochai hunlian beiju qianshi”，《南通師專學報》[*Natong shihzhan xuebao*]，卷 10 期 1[vol. 10, no. 1]，1994 年，頁 28-32。

張毅蓉 Zhang Yirong，〈“巴爾扎克現象”與《紅樓夢》的輓歌情調〉“Balzac xianxiang’yu Honglou meng de wange qingdiao”，《南通師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Natong shihzhan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卷 16 期 2[vol. 16, no. 2]，2000 年，頁 49-52。

舒曼麗 Shu Manli，《紅樓夢四大家族與金陵十二釵》*Honglou meng sidajiazu yu jinling shier chai*，臺北[Taipei]：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Xinwenjing kaifa chuban gufen yixian gongsi]，2005 年。

蔣芳 Jiang Fang, 《巴爾扎克在中國》 *Balzac zai Zhingguo*, 北京[Beijing]: 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Beijing shehui kexue chubanshe], 2009年。

賴惠敏 Lai Huimin, 《天潢貴胄——清皇族的階層結構與經濟生活》 *Tianhuang guizhou: Qing huangzu de jieeng jiegou yu jingji shenghuo*, 臺北[Taipei]: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Zhongyang yanjiuyuan jindaishi yanjiusuo], 1997年。

Balzac, Honoré de. *La Comédie humaine*, t. I. Paris: Pléiade, 1976.

———. *La Duchesse de Langeais. La Comédie humaine*, t. V. Paris: Pléiade, 1977.

———. *Œuvres Diverses*, t. II. Paris: Pléiade, 1996.

Barbérís, Pierre. *Balzac: une mythologie réaliste*. Paris: Larousse université, 1971.

———. *Le monde de Balzac*. Paris: Arthaud, 1973.

Guyon, Bernard. *La pensée politique et sociale de Balzac*. Paris: Armand Colin, 1967.

Engels, Friedrich. “Engels to Margaret Harkness In London,” *Marx-Engels Correspondence 1888*, Moscow: 1953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88/letters/88_04_15.htm。

2012年4月1日檢索。